

孙犁抗日小说思想的现代性呈现

闫 玮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孙犁的抗日小说呈现出浓郁的现代性特质,它体现出作者对国民思想现代性更深入的思考,完成了现代文学从人的自我实现到强健的民族精神重建的思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孙犁小说的思想现代性,不是建立在对民族传统的颠覆或对立立场上实现的。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固守着传统中的优良素质,在对传统的坚守中汲取现代的文明因子。孙犁就在这样的反传统和现实化的过程中达成了思想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理想融合。

关键词:孙犁;抗日小说;现代性;民族精神;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3-0008-04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的确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它标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民族性和现代性在不断交错中的终极融合与发展。赵树理、丁玲、柳青、马烽等一系列作家成为最能代表民族化、大众化文学发展方向的代表。而孙犁却在解放区作家中独树一帜,奔赴延安后,他写的一系列抗日小说也在工农兵文学大潮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学风范。多年来,学界对孙犁小说蕴含的民族性质素颇多关注。而笔者认为,孙犁抗日小说中呈现出浓郁的现代性特质,更是决定孙犁小说独特文学史价值的重要因素。

对“现代性”的定义在目前的学界仍具不确定性,但大体可以表述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从传统到现代根本转换的历史性实现;二是主要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文化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表述系统中,现代性首先便表述为一种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实现进程。在现代文学30年崎岖复杂的思想现代性进程中,孙犁的抗日小说显现出它独特的文学价值。

五四时期,以科学理性和个性解放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启蒙运动标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思想进程的开端,人们在反传统的开放格局中重新审视自我,他们以反封建的狂放姿态表达了对现代民主自由的向往,个性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现代性的重要表征,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大力倡导人的文学,胡适认为社会要发展,就要先“救出自己”,“解放和发展个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1]。李大钊认为“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2]。由此,众多作家通过对“人”的重新审视达成思想现代性的最初表述,并且演化为一股贯穿现代文学始终的强大的个性主义思想大潮。

在孙犁抗日小说出现的20世纪40年代,呈现出分散多元的文学历史局面,这股力倡个性主义思想的创作大潮依旧风头强劲,与解放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民族化文学潮流形成犄角之势。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

收稿日期:2013-03-29

作者简介:闫 玮(1968-),女,河北保定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身为鲁艺教师的孙犁自觉承载了历史赋予的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他的抗日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冀中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生活,展现出人民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以及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他小说中的“人”不再仅仅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更是军民的“人”、群体的“人”、民族的“人”,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是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格外关注、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必胜信念。他们共同展示出牢不可破的民族向心力和乐观强健的民族精神。

显然,随着国民思想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建立已不再是孙犁小说的主旨所在。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最终是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最终指向,人的发现的终极目的亦在于达成国民现代意识的集体实现,也就是民族精神的重新建立。五四时期,鲁迅的作品就已经标举出我们民族现代性思想进程的跨越性实现。他的启蒙思想中,“立人”就包括确立人的自我意识和国民意识,而人的发现不只是个人的发现,更应是国民理想精神的建立,他的《呐喊》、《彷徨》就以深切的思想全面系统地审视着我们民族的国民劣根性。但是,在现代文学思想现代化的历史行进过程中,国民集体意识、民族意识的关注和审视却呈现出相对的不足。出于对封建思想体系中群体本位思想的自觉反抗,五四时期的现代思想启蒙多是表现为作家对个体小我的关注和尊崇:鲁迅小说中苦闷彷徨的自我、郭沫若《女神》中极富狂飙精神的自我、郁达夫小说中忧郁感伤的自我……直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试图获得双重价值实现的“革命+恋爱”式的自我、还有世俗生活中的平庸的自我,都市文明中矛盾的自我,战争中苦难的自我、奋战的自我……虽然在鲁迅的表意系统中,也试图通过个体形象的典型塑造来达到对国民思想的整体审视,但总体表现出个体文化精神的强化、群体文化精神的弱化态势。

无疑,这些纷纭复杂的自我形象展示出我们国民思想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但也不难看出他们的思想现代性实现中个体与群体、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相互游离的态势。以救国救民为基点的现代性的理念建构,尚未实现从人的建构到民族国家的宏大建构。因而孙犁抗日小说所显现出的鲜明的民族意识便具有了特定的文学史意义:孙犁用文学的形式完成了他对国民思想现代性更为深入的思考,完成了人的自我实现到强健的民族精神重建的思想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绝不是传统的爱国思想及民族意识的简单回归,而是对现代民主主义(包括个性主义、人道思想)现代思想的深入演进。更为有意义的是,虽然左翼革命文学直至解放区工农兵大众文学都表现出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但严格说来这种重视多是在政治话语体系而不是文学话语体系中获得的,与最能体现民族化、大众化文学方向的赵树理、柳青、马烽等相比,孙犁似乎一直具有某种“边缘”性——“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4]。这第二标准,当然就是指他从不盲从于政治需求而失去自己独立的个性,在民族精神重建的这个颇为政治性的语境中,保持了自己创作中文学质素的纯正。

从现代性思想发展的大致进程中不难看出,反传统一直是思想现代性实现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直接源于对西方入侵的应对,是以救亡图强的民族主义作为主旋律展开的。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对现代化运动发挥了具有魔力般的社会动员作用;另一方面也经常淹没现代化的主题,使之偏离主航道,并进而派生出救亡与启蒙、西化与民族化、传统与创新等一系列困扰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课题”^[4]。这种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对立矛盾的态势几乎贯穿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始终。但孙犁小说的思想现代性,不是建立在对民族传统的颠覆或对立立场上实现的。不同于鲁迅等的对国民性的批判,孙犁更侧重抒写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优良因子:不论是老人孩子,还是男人妇女、战士群众,无不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性,无不呈现出勤劳质朴、机智顽强的人格之美:《芦花荡》中的老头子本领神奇,孤身战胜十几个鬼子,《荷花淀》中的水生不怕生死、抛家舍业投身抗日队伍,还有《黄敏儿》中那些机智勇敢的儿童团孩子们,芦花荡里青纱帐中的那些奋勇杀敌的战士们……特别指出的是,孙犁更多的是用女性承担起民族解放战争的宏大叙事,承担起重建理想民族精神的思想现代性内容。这些女性无不符合传统文化对女性

的道德和审美要求,她们勤劳善良、温柔贤淑、聪明能干、通情达理,《荷花淀》、《子弟兵之家》、《丈夫》、《嘱咐》中那些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养老抚幼,吃苦耐劳,她们深明大义,支持男人们上前线,又默默承受着战争带来的辛酸苦辣……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背离甚至颠覆一直是作家思想现代性的主要表述方式。因此,类似孙犁笔下的这些颇具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不仅被弱化甚至经常被刻意塑造为自觉维护封建道德思想的懦妇。倒是那些个性解放富于反叛精神的现代女性抢尽了风头:从五四时代的田亚梅、子君、露莎到大革命之后的梅行素、莎菲、繁漪……与她们相比,孙犁的这些进入民族精神象征系统的女性形象,显然并不是对峙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女性,这到底意味着是对传统女性思想观念的回归呢,还是对现代文学新女性系列形象的补足呢?

但孙犁笔下的这些“美到极致”的劳动妇女绝不等同于传统的东方淑女或贤妻良母,她们同时具有了现代气质与时代精神:自信、独立、胆大、刚强,在酷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她们群体呈现出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吴召儿带领部队撤退转移是那么机智勇敢,二梅带领妇女破路保护麦收是那么热情感人,水生嫂与伙伴们组织了妇女武装,与大部队并肩战斗是那么淡定自若,还有《光荣》中的秀梅,《芦花荡》里的大菱、二菱,《澆园》里的香菊……“这些人物,平时都是些热爱劳动和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但战争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她们的性格。侵略者的炮火轰毁了她们家园,也轰毁了她们处于封闭状态的狭小精神世界”^[5]。这些既具传统美德又具现代精神气质的劳动妇女,还有那些老人、孩子、战士们,不正是强健的现代民族精神的形象体现吗?鲁迅建设理想强健的现代民族精神的思想现代化指向,在孙犁的抗日小说中得以理想的呈现,而困扰整个现代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矛盾也终于得以合理的调和,这不不愧是孙犁在中国文学思想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贡献。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现代性进程中,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一样是建立在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基础上的文学呼唤与表达”^[6]。于是,那些贫穷、荒凉的乡土农村,便自然成为现代进步文明的对立物:在乡土作家那里,它们是封建宗法制的栖息地,是生殖愚昧麻木国民的原土,是远离现代文明、制造野蛮和悲剧的土壤;在革命作家那里,它们是一块块充满阶级仇恨的土地,是一块块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沦丧的国土,是一个个鲜血淋漓硝烟弥漫的战场……创造一个充满现代文明的新世界,成为时代青年共同的人生方向。鲁迅笔下的魏连受、叶绍钧笔下的倪焕之、柔石笔下的萧涧秋等一系列形象无不呈现出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强力挣脱和对现代文明的深情呼唤。

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深厚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它的现代性实现绝不是通过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彻底否定完成的。孙犁的抗日小说对乡村文明的热爱是鲜明的:“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芦花荡》);“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荷花淀》)……无不充满了作者对乡土的自然之美和淳朴美妙的生命形式的由衷颂扬。孙犁抗日小说中呈现的20世纪40年代,乡土家园依旧贫瘠,依旧残败,依旧遭受着日寇铁蹄的践踏,但作者却有意隐去战争的硝烟战火、血腥残酷,孙犁说他早期创作是他个人对抗战时期“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的记录”^[6],毋宁说是他对这片生他养他的乡村故土的浪漫书写,是他对厚重的乡村文明的执着坚守。

但这绝不是他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对抗。他对那片乡村故土的诗化描绘,不同于废名对世外桃源的隐逸式书写,也不同于沈从文笔下对边城世界田园牧歌式的留恋抒情。对于现代都市文明,废名、沈从文都表现出了与新感觉派作家一样的抗拒情绪,他们远离人间烟火、远离社会现实,动情地书写着他们的理想境界和怀旧情绪,于是乡原故土被他们幻化成一片片恬静优美的人间净土、一个个超脱现实的精神家园。孙犁笔下的乡村世界美得也像一首诗:白洋淀那皎洁的月光、银白的淀水、飘飞的芦花,“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高高地挺出来”的“粉色荷花箭”(《荷花淀》)……但它

更是一曲嘹亮的战歌:抗日军民同心协力,抗击日寇,他们用生命护守着这片宁静祥和的乡村故土,也憧憬着抗日胜利后幸福美好的现代生活。在这里,对自然质朴的乡村文明的固守和对富裕安康的现代文明的期盼融为一体。孙犁就在这样的反传统和现实化的过程中达成了思想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融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固守着传统中的优良质素,在对传统的坚守中汲取现代的文明因子。经历了 30 年风风雨雨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思想现代化的理想归宿也就在于此吧。

参考文献:

- [1]胡 适.易卜生主义[M]//中国现代文论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255-259.
- [2]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M]//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47.
- [3]孙 犁.文学和生活的路[M]//秀露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 [4]王晓初.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轨迹[J].文学评论,2002(2):102-110.
- [5]郭志刚.孙犁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96.
- [6]孙 犁.孙犁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237.

The Modernity Presentation of Sun Li Anti-Japanese Novel's Thoughts

Yan Wei

(Chinese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Sun Li's anti-Japanese novels present the rich modern features, 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thinking more deeply on the national ideology of modernity, completes the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self realization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building national spirit ideological modernization. Sun Li's novels idea of modernity is not built based on the subversion or opposite position against the tradition. It clings 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factors in reality and absorbs the civilization factors in the modern times. Thus Sun Li blends idea of national spirit with modern idea in the process of anti-tradition and reality.

Key words: Sun Li; anti-Japanese novel; modernity;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 王 作)